丁大见专栏·花草见

田 菁

南淝河上船只往来，远望一派深秋气象。乡野河堤上，却长着一片草本植物，青绿青绿的，叫不出名来。

其茎秆直立，不粗，皮色青里带点红。枝叶呢，你搭着我，我搭着你，疏疏密密地穿插着，舒展成一片。远看是一丛绿；走近了，才见长圆形小叶，窄窄的长长的，一左一右地排着，一直排到叶梢，精巧得很，像含羞草，也像合欢。这类叶子像羽毛，便叫羽状复叶。

阳光照下来，叶子松松地张着，缝里漏下光，洒在地上。吹过一阵风来，碎光浮动，一只蚂蚱竟在逐光影，一蹦一蹦；小叶翻动，正面是深绿，翻过来浅些，一道深一道浅地漾开去，又漾回来；我伸开五指，从叶上轻轻扫过，手心竟觉得松软。秋风不凉不热，刚好。

小叶青绿，衬着碧波，秋水悠悠。这时节，田菁的花还开着咧！荚果也垂了下来，一根一根，细长细长的，有筷子那么长，略弯，青里透一点褐，三根两根挂在梗上。忍不住用手捏一捏，里面有硬硬的豆子。扯下一根，剥开皮壳，小豆短圆柱形，一粒粒整齐地排着，比绿豆还小一圈。手一抖，豆子竟蹦了出来，蹦蹦跳跳，一粒粒四散开去，不知躲哪里去了。

花是鹅黄色，开在叶间，从叶腋里抽出一根细梗，疏疏地缀上两三朵。旗瓣椭圆形，小小的，边儿微微翻卷，散着紫黑小点，像裙边的碎花；翼瓣张开，像领口。整朵花倒像穿了件小礼服，来赴秋日的宴。花从八月里开起，陆陆续续地开落，能开到十一月。一天里头，下午那阵开得最欢。

我用相机拍了花果枝叶。回家梳理，查阅资料，逐图比对，才知道它叫田菁，豆科田菁属一年生草本。这名字取得好，田里的精华，故名田菁。才知它不是寻常的野草。乡人种它，拿它做绿肥。

农忙时节，经过乡村小店，门口堆着一袋一袋化肥，上面印着两个醒目大字“尿素”。名字不大好听，倒也接地气。尿素就是氮肥，作物长个子、绿叶子、攒蛋白，都靠它。

古时候没有化肥。乡人就种田菁，不赏花，不收豆，秋天里连茎带叶翻进土里，让它慢慢烂成肥料，地就肥一层。这叫“养草肥田”。《齐民要术》里讲：“凡美田之法，绿豆为上，小豆、胡麻次之。”绿豆和小豆是豆科，能结瘤固氮。

田菁也是豆科。乡下人为什么爱用它呢？我带了铲子，铲开硬土，连根挖出来看：根上挂着一粒一粒白色小疙瘩，掐开，里头是粉的。那是它的根瘤菌攒的肥。田菁属里另有一种长喙田菁，茎上也能结瘤，根瘤茎瘤一起固氮，肥力翻倍。

它长得也快，不到俩月，能长一人多高。不挑地，沿海滩涂、盐碱地上也能生长，根扎得深，在板结的土里一点点延伸，把土慢慢养软养肥。种上几年，白茫茫的盐碱地慢慢缓过劲来，长出些灰菜、马齿苋。

田菁的叶和种子可入药。《泉州本草》里有一味“向天蜈蚣”，说的就是田菁的叶。味甘微苦，性平，能清热凉血、解毒利尿。乡野人家，小病自医，是常有的事。谁家孩子目赤肿痛，老人小便淋痛，田间顺手揪一把，外用捣烂，内用煎服。不过种子有小毒，乡人不随便吃。

它长在堤上，开花，结荚，把肥攒在根里，就这么长着。可它长过的地方，土松了，叶绿了。我先前不知其名，也不知其能，只当是无用的野草，真是偏见。偏见无处不在，有些人名字不为人知，本事却不小。有本事的闲居田园，能当栋梁的隐在山野。诸葛孔明没出山时，也不过是个种地的。刘备三顾茅庐，三分天下，卧龙之名天下知。想起高适的诗：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”

高适早年也穷过，中年不大得志，五十岁以后才到塞外军中，一生起起落落。后来诗名扬天下，谁人不识高适呢？可这样的人，古往今来有几个？

多数人的默默无闻，像这堤上的草。草木一秋，人活一世，开自己的花，结自己的果，过自己的日子，匆匆也就过去了。荒野里的草，谁在意呢？偶尔有人路过，看一眼，觉得好看罢了，便又匆匆赶路。谁肯蹲下来，拨开枝叶，看一看花果的样子，问一问它的名字。

田菁长在堤上，不声不响；割下来喂了牛羊，翻了肥田，还能替人清一清火气。这草看似平平无奇，真是从头到脚，没有一样是白长的。



丁大见，1990年生于怀宁，现居合肥，毕业于安徽大学，艺术学硕士，装帧设计师，剪纸艺人，画家，多次荣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奖，作品先后受到中央电视台、新华社、央视新闻等数十家媒体专访报道。

小说世情

报出你的名字

杨芸滔

正午的街道像被扣在滚烫的玻璃杯里，阳光如白炽灯，照得柏油路白晃晃一片，行道上椰子树的影子蜷缩成细碎的硬币，连浪花拍岸的声音都蒸腾成咸腥的水汽，路边的猫狗都躲在阴影里，不肯出来。

住在填埋场附近的拾荒大叔老书，拎着两个袋子，戴着破旧草帽，一个个地翻找垃圾箱，这会儿没人出来跟他抢。

回收站老板是熟人，会吹着风扇，泡一大盅茶等他，偶尔还会多给点钱，所以他更愿意多走一里地，来这里卖废品。

“老书，你来了啊！”老板用纸杯倒了半杯茶递给他，然后帮着将两只巨大的麻袋放到秤上，“一共118，给你120。”

“谢谢。”老书抹了一把汗，原本脏兮兮的脸更脏了。“老板，我过几天要走，到时就不到你这里卖废品了。”

“啊？”老板有些吃惊，“我正要给你说，上次有个厂子想找人看夜场，一个月2000，包吃住，你只要拿个身份证就行了。”

老书摇摇头，半晌才缓缓地解释，“家里有事，我娘老了，就想看看我，我儿子也回来了，说给我养老。”

“这可是大好事。”老板又递了瓶矿泉水给他，由衷地替他高兴，又从包里掏了几十块钱塞到他颤抖的手里。

老书拖着车，揣着钱，踉跄地转了弯，然后大步向前走。

不远处有个小酒馆，一群搬砖工人正围着一盆毛血旺喝酒，看到衣衫褴褛的他也不嫌弃，大声喊着，“老术，来喝酒。”“老树，一会儿打扑克。”

他没有接话，继续往前走，身后还有人在呼喊，“老书，你又不娶老婆，又不存钱，来喝喝酒打打牌。”

“我不叫老术，也不叫老树，也不叫老书。”他站在三岔路口，努力回想，自己曾经叫什么名字？该怎么写？

“要是我有身份证就好了。”他茫然地望着滚滚车流，想起回收站老板的好意。那是一份顶好的工作，风吹不着雨淋不到，吃得饱穿得暖，还能吹上空调。

懊恼的心情让他慌张、难过、惴惴不安，想回去问问老板，能不能不要身份证？不行，那样就会引起麻烦，他摇摇头，麻木地顺着人群走，推车里稀稀拉拉的垃圾落了一地，被其他拾荒者一抢而空。

“神经病。”骂他的是住在填埋场下面汽车墓场的老齐，他经常会偷偷拆下汽车配件去卖，那玩意很值钱，一个就能卖好几十。老齐曾经也带他去过，原本拿了七八件，据说能卖四五百，但都被他扔了，因为他每拆下一个，耳边就会响起警笛声，闹哄哄的，让他六神无主。

他请老齐喝酒，在这里能跟他喝酒的人只有老齐了。想当年，那些村主任、书记、社长要跟自己喝酒都得提前约。

“那会我儿子小，就敢用筷子偷酒喝。”

“我爱人炒的麻辣鸡丁好吃惨了。”

“我最爱喝五粮液，泸州老窖不好喝。”

…… ……

老齐不喝酒只吃菜，主要是他买的酒太次，比假酒还假。他已经习惯了老书的酒话，并且十分鄙视地给他白眼。

“我要走，这里不能待了。”也许是要走了，老书醉得格外厉害，他说二十年前，自己有个家，一个谁都羡慕的家。

他怕老齐不相信，从发黑的枕套里翻出两张褪色的照片，是张全家福，年轻的老书人模人样地抱着一个美女。

“报出你的名字。”

听到久违的乡音，看着面前戴着大檐帽的警察，以及手腕上明晃晃的手铐，老书怔住了，很久才反应过来，怯懦地说：“舒逸，我叫舒逸。”对，我叫舒逸，舒适又安逸，小时候爸爸说要好好学习，当个正直的人，就能过上舒适又安逸的好日子。

后来呢？

舒逸坐在返乡的车上，还在想为什么自己过得这样辛苦。

二十年前，自己是供销社的会计，管理着几十上百万的资金，日子过得快乐又潇洒，妻子贤惠，儿子聪明，父母身体健康，兄弟姐妹和睦，走路都带风。

偶然一次，他接触了麻将，开始赢了又赢，后来一路输，输红眼了就把手伸向公款，一次、两次、二十次、五十次……被发现时已无路可退，只好逃，不敢留在四川，不敢报真实姓名，不敢办身份证……甚至不敢路过公安局那条街。

“ 抬头、挺胸、目视前方、看着镜头……”

一张崭新的身份证递到舒逸面前时，看着上面沧桑的男人，舒逸哭了，在泪水中，他似乎看见二十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，迈着矫健的步伐，路过麻将馆。

“不要进去！不要！”他在心里拼命地喊开了。

人间小景

在柬埔寨乘坐“客先死”

黎泓池

前些天去了一趟柬埔寨，初到金边，便被街头的一种三轮车迷住了。司机高高坐在后面，像操纵提线木偶似的把握方向，而乘客却大剌剌地敞在前面，两腿悬空，脸迎风，与车水马龙近在咫尺。当地人给它起了个令人心惊的名字叫“客先死”——客人坐在前头，司机在后头，遇上事故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前面的客人。这名字听着吓人，仿佛乘客不是乘客，而是某种人肉保险杠。

我斗胆坐了一回。刚把屁股搁在那窄窄的皮座上，一辆丰田便贴着我的膝盖呼啸而过。我本能地想往后缩，却无处可退，身后是司机的膝盖，再后面是发动机。原来这设计有个妙处：你既无遮拦，也无退路，全世界都看得见你的惊慌失措。

司机是个精瘦的柬埔寨汉子，光脚踩在踏板上，哼着高棉小调，对擦身而过的危险浑然不觉。他见我抓紧了扶手，笑得露出了金牙：“先生，不要怕，我开了二十年，一个客人也没死过。”这话说得颇有底气。没死过的客人，大约都成了回头客。

在东南亚的烈日下，这些三轮车鱼贯而行，像一群红黄蓝绿的甲虫。坐在前头的有西装革履的职员，有挎着菜篮的妇人，也有我这样的游客。大家一律把脸交给热带的风，把安全交给身后的陌生人。这种信任朴素得近乎天真，却又实在得不容置疑。

反观中国街头，如今摩托车已不多见，遍地是轻快的电动自行车。

奇妙的是，坐过几次之后，我竟品出些滋味来。坐在前面，你不再是封闭铁壳里的旁观者，而是街头的一部分。小贩递来的冰镇椰子水能碰到你的鼻尖，摩托车后座姑娘的纱丽能拂过你的手背，连路边摊的烤香蕉味都格外真切。这种近距离的参与感，是豪华轿车里永远体验不到的。

有一回堵在长长的车流里，旁边卖椰子的姑娘举着砍刀递过来一个青椰，我正犹豫着要不要接，司机突然伸手替我接住，插上吸管塞到我嘴边：“喝吧，喝完把壳扔回去。”我吸了一口，正要道谢，他指着前方说：“看，那个穿黄衬衫的，上礼拜坐我车，喝了一半吓得把椰壳扣自己头上当头盔。”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那人正骑着摩托车冲我们挥手，脑袋上果然还顶着半个椰壳。满街的喇叭声里，那个椰壳在夕阳下一晃一晃的，像顶滑稽的勋章。司机转过头对我说，常有老主顾专门挑堵车时坐他的车，就为了看这些。比看电视有意思，电视里没有汗味，也没有椰壳。

傍晚，我坐着车穿过金边的闹市。夕阳把整条街染成了蜜色，前面是望不到头的摩托车尾灯，身后是司机忽快忽慢的踏板声。我忽然觉得，人生许多时候不也这样么？前面是迎面而来的种种，身后是掌握方向的那双手，你既不能抢过方向盘，也不可能跳车逃跑，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坐稳了，睁大眼睛看着前方。

下车时，我给司机双倍车费。他推辞不过，又露出金牙笑了：“先生明天还坐我的车，保证一个客人都不会死。”我忽然明白，“客先死”这名字起得实在精妙。它坦然地承认风险，却用二十年的平安化解了畏惧。反倒是那些看似周全的安稳日子，往往让人忘了自己其实一直坐在某辆敞在前面的车上，只不过有人选择闭眼，有人选择迎着风。

回酒店的路上，我频频回头。那些五颜六色的三轮车还在暮色里穿梭，前面的乘客们或蹙眉或微笑，把自己放心地交给了身后的人。我忽然想，所谓生活的智慧，也许就是学会做一个合格的乘客，既不对危险视而不见，也不被危险吓得缩回壳里，而是张开双臂，把迎面而来的风都接住。

后来我查到，这种车在别处有更温柔的名字，叫“嘟嘟车”或“突突车”。但“客先死”这个凶险的名字却深深地刻在了我记忆里。它像一句坦诚的玩笑，提醒着我们所有旅途的本质。无论你坐在前面还是后面，横竖都只有这一遭。与其总在算计风险，不如偶尔把自己敞出去，像东南亚的夕阳下那些乘客一样，明知“客先死”，偏做“客先行”。

这大约是热带的哲学：既然躲不过滚滚车流，不如把自己变成车流的一部分，把脸迎向风，把后背交给信任，然后大大方方地，笑上一路。



田园秋景 李昊天 摄

信笔扬尘

历史遗迹背后的故事

胡 铭

历史遗迹是古城的象征。

千年古城安庆，又称宜城，有“万里长江此咽喉，吴楚分疆第一州”之誉，自清乾隆二十五年至民国时期为安徽省府，更是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之一。深厚的底蕴让这座古城有了血脉，有了骨骼。保存完好的振风塔、谯楼成为安庆的地标，还有后期修复的英王府、古柱史牌坊、赵朴初故居等也都成了地标性建筑。

这些史迹默默无语，守着古城，守着经年的传说。

外地游客来安庆，都乐意去看一看这些历史遗迹，感受老城的气息，品赏传统的文化。

历史总是和风雨交织在一起，文物古迹也都经历过辉煌与灰暗的不同时期，铸就了各自的生命特征。有些古迹因年代久远而自然毁损，有些古迹却是人为地遭到破坏，能安全保存下来的都是很幸运的。在安庆这块土地上，有不少文物怆然地走完自己的历程，但也有许多文物得以存留于世，殊不知，它们的背后大都藏着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有一个人，常静静地聆听古城的心跳，解密历史文物所蕴藏的“语言”，对历史遗迹的保护尤为敏感与关注。他，就是我的父亲胡寄樵，一位殚精竭虑的文物工作者，生前系安庆市博物馆馆长，毕生致力于考古和地方史学研究。

安庆是太平天国时期三大重镇之一，英王陈玉成多年驻守于此，其府邸在哪？众说纷纭。1980年代父亲考证任家坡任塾第宅为英王府，并在府内剥剔出四幅壁画，得到太平天国史学界的公认。早年拆迁大潮席卷大地，房地产开发商盯上了这块区域，危急之下父亲多方奔走，慷慨陈词，呼吁保留此宅。在这场拆与保的僵持中，“城市建设的需要”还是占了上风，原本三进的王府被拦腰砍去一大半，英王灵魂发出沉沉的叹息，落入烟尘之中。几年之后，没想到剩余的房屋依然得不到安稳，有人想故技重演。“谁胆敢拆除英王府，我将上书中共中央。”父亲怒斥道。终于，这部分府屋幸运地躲避了一场灾难，否则哪还有今天修葺一新的英王府。

世太史第，四代翰林，闪烁着一个家族史的荣光。这座老宅始建于明代，既有北方建筑的豪放，又具南方建筑的精巧，透着浓郁的地方特色。赵朴初老先生便诞生于此，故又称赵朴初故居。这里地形开阔，且系平房，如果开发势必会有很大的经济空间。此屋被活生生地列入拆除范围，父亲按捺不住了，多次向市领导反映，力保这难得的故居，后又经多番论证，赵朴初故居在附近挖掘机的轰鸣声中获得了新生，原先破败的房屋也得以修缮、扩建，一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展现出新的姿态。

一座高大的古柱史牌坊矗立于钱牌楼东首，这也是安庆的一道景观，游人过此，皆抬头仰视。此牌坊并非明代建造的原始文物，也不是完全的新建物件，这正是该牌坊的神秘之处。原建的汉白玉牌坊早年被捣毁，只有抱鼓石和部分断开的额枋石雕构件存留下来，堆在一起，无人问津。明朝廷敕建的古牌坊如果就此消失，殊为可惜。于是父亲便向市政府和主管局建议，利用残剩部件予以修补，重塑一座牌坊，以还原史貌。1990年代，在专业人员的操作下，零零落落的残件被捡拾、拼接起来，缺失的部分以新石料进行填补，运用浮雕和透雕技法，再现了如意、莲瓣、瑞兽、花草、祥云等纹饰。由于原字额遗失，父亲应邀在牌坊上补题“古柱史”三个大字。重新耸立的不仅仅是一座牌坊，而是古城的一段记忆。

1908年熊成基、范传甲等革命党人秘密召开会议，策划起义具体事项，这也是辛亥革命前安徽规模最大的新军武装起义。作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熊成基马炮营起义会议旧址，早年被省专家考定为杨家塘“杨氏试馆”，后来父亲考察发现，其会址并非此处，而是在三祖寺街的“叶氏试馆”。考证的过程中有很多波折，有很多异议，还有人善意提醒父亲，这么做没有任何好处，也不一定就能更改这一论断。可父亲写下一篇篇文章，以史料说话，终得公认。就连原先嵌于“杨氏试馆”的重点文物标识牌也摘了下来，最后在“叶氏试馆”里落座。自此，纠正了常年以来的讹误，让史实更加清晰，让真正的会议旧址得以保存并展示。

父亲怀揣文物保护之初心，竭力让濒临消亡的历史遗迹活过来，与城同在，这便是他朴素的理念与执着的追求。苦中有乐，他做到了。如今，父亲走了，但他曾经保护过的这些古迹依然闪着光。

